

Robert Vannoy, 申命记, 讲座 2

© 2011, Robert Vannoy 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JEDP 理论和申命记续

C. 申命记年代测定对 JEDP 理论的重要性 1. 回顾

好吧，如果你看一下课堂讲课的大纲，我们从罗马I开始，我们做了A和B，“对申命记的一些一般评论”和“关于摩西五经起源的当前共识”，以及我们正处在 C 的中间，“申命记的年代对 JEDP 理论的重要性”。现在，为了稍微回顾一下这一点，我向你们提到了韦尔豪森对摩西五经的分析结果之一是他分离出了一些法律法规，然后他将这些法律法规联系起来与不同的文件，以便他有出埃及记 20-23 中的圣约法典，他将其与 JE 联系起来。然后他有了申命记法典，当然，它与源文件 D 相关。有神圣法典 [H] 和祭司法典 [P]。《祭司守则》与源文件 P 相关联；这个神圣法典与 D 大约在同一时间进入某个地方。但关键是，你得到了 JE DP 进展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进展。我们上周讨论过这个问题。D 代码是唯一一个在公元前 621 年有时间顺序的代码，因为假设约西亚时代在圣殿中发现的法律书是《申命记》，写于公元前 621 年左右。崇拜。韦尔豪森说，《申命记》法典要求集中化，而《出埃及记》中的《圣约法典》允许有多个祭坛和礼拜中心。

2. 驱动程序方法：D 作为 JE 的扩展以及与圣洁守则的相似之处

我想我在最后一小时结束时给你们读了《德赖弗的申命记》评论。德赖弗是韦尔豪森的追随者。他说：“申命记与 J、E、H 和 P 这三个法典的不同关系可以概括地描述如下。”他将《申命记》与三部法典的关系视为《JE》法律的扩展。所以D是JE的扩展。“它在几个方面与神圣法则相似。”有点类似于神圣法典。

“它包含的法律典故并不总是与 P 其余部分中编纂的仪式制度和仪式相同，但相似。”所以他说它暗指那些在 P 中被编入法典的东西，但直到很久以后才被编入法典。

这就是韦尔豪森提出的一般论点，自那时以来，许多人都遵循这一论点。该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以色列的宗教观念是进化发展的。这就是该理论背后的假设。这确实是起点。你假设以色列的宗教机构、实践和思想以进化模式发展，然后你以反映假设的增长或发展的方式安排材料。这确实是整个结构的背后。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特别是当我们谈到申命记和集中崇拜时。但目前，我想让您注意的是，在整个 JEDP 结构中，《申命记》是基石。所以这是唯一的固定点，621 BC

3. Wellhausen Dt。是第二期，取决于 J 定律

《古代以色列史序言》一书中确实说过，申命记是基石，这本书真正改变了旧约研究的整个过程。在第 32 和 33 页，他说，“作为圣约之书”，即圣约法典，“以及整个耶和華派著作”，J 文件总体而言，“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预言时期”。邪教。所以申命记是第二个斗争和过渡时期的法律表述。”所以你看，你从《圣约法典》和《J》文件进入了《申命记》的第二阶段。他说，“由于申命

记在文学上对J法则的依赖，历史秩序更加确定”，因此D依赖于J，“叙事可以独立论证，是公认的事实。

由此，我们很容易相信，工人们的发现促使约西亚国王摧毁了当地的圣所，而这正是《申命记》这本书，它最初一定以比现在更短的形式独立存在。至少。至少在《摩西五经》的所有书卷中，只有这一卷，才如此专横地表达了将祭祀崇拜限制在一个选定的地点。只有在这里，这种需求才能以其激进的新颖性体现出来，并主导立法者的整个倾向。”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后来在他的书里，你看，他在第368页确立了这一进程之后，他又提到了第一章《古代以色列历史序言》。我想说，这本书可能比过去500年来任何其他一本书都对旧约研究方法带来了更多的改变。

4. 邪教的集中化

在第368页，他说：“我总是回到邪教的集中化，并从中推断出特定的分歧。”公元前621年约西亚的中央集权，这是他的焦点。他说：“我总是回顾这一点并从中推断出特定的分歧。我的全部立场都包含在我的第一章中。”他在第一章概述了这一进展。“我在那里明确指出了对以色列历史如此重要的一点，即先知团体在崇拜的伟大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说的“崇拜的巨大转变”指的是向中央圣所的转变。这成为他整个理论的基石。他说：“我总是会回到那个话题。”

5. JEDP 的其他学者：申命记。作为公元前621年日期的基石

现在，我想做的是给你们一些其他旧约学者的评论，这些评论表明这不仅对韦尔豪森的体系，而且对其他追随他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1951年，HH Rowley编辑出版的《旧约与现代研究》一书中，收录了旧约研究各个方面的论文集，GW安德森在书中有一篇关于“以色列宗教”的文章。在第283页，在那篇《希伯来宗教》的文章中，他说，“在《申命记》的日期和性质方面，冲突最为激烈，而《申命记》是韦尔豪森年代学体系的基石。”他说《申命记》的日期是韦尔豪森年代学体系的基石。他说，冲突从未如此激烈。“如果这里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整个理论的结构就会被削弱，甚至可能崩溃。”安德森所说的是，如果你能通过《申命记》来动摇621年的日期，整个理论就会崩溃。

HH Rowley 是本书的编辑，他自己写了一本名为《旧约的成长》的小书，于1950年出版并重印了多次。在第29页，他指出：“因此，申命记法典在摩西五经批评中至关重要，因为其他文件的日期主要是通过与它的关系而确定的。此外，该法典可以比任何其他法典更准确地确定日期，因为约西亚改革所依据的法律书最有可能是《申命记》，而这本书首次为公众所知是在那时。”同样，您会看到，它很重要，因为其他文件都带有与其相关的日期。

奥托·艾斯费尔特（Otto Eissfeldt）撰写了《旧约全书：导论》，这是对《旧约全书导言》的相当标准的处理，出版于1965年，第171页，他说：“德·维特（de Wette）在1805年的批判论文中坚持这样的论点：申命记是这部作品不同于《摩西五经》的早期书籍，并且出自后来的作者之手，因此认为《申命记》

起源于其发现时间之前不久，即公元前 621 年。并且发现了一个固定点，通过它也可以确定摩西五经其他组成部分的年龄。因此，德维特的论文为摩西五经批评提供了阿基米德的观点，它可以依附于这一点，以便将其从教会和犹太教堂传统的束缚中解救出来。那是什么？这就是马赛克的作者观念，“并用另一种对摩西五经及其部分的年代测定法取而代之。诚然，从德韦特的判断中得出的必要结论只是逐渐得出的。他本人坚持认为，我们称之为 P 的消息来源比 D 更古老。”看，这个顺序花了很长时间才整理出来。Wellhausen 按目前的顺序排列，P 排在后面。但阿基米德点就是艾斯费尔特在这里所说的申命记与约西亚日期（公元前 621 年）的联系的文章。

6. 1928 JBL 卷申命记。 & 公元前 621 年日期

现在，这是相当强大的术语。有很多关于此的文章，我在您的参考书目中有这些文章。如果您查看该参考书目第一页底部的“引言和批评”，然后再翻到以下几页，您会发现第二页上有一篇由 G. Dahl 撰写的文章，《申命记当前接受日期的案例》，《圣经文学杂志》，第 47 卷，1928 年。还有 Julius A. Bewer 的一篇，《申命记早期的案例》，JBL 47，1928 年。然后，在下一页，有赫尔比·巴顿的一篇，申命记流亡后起源的案例，JBL 47，1928。换句话说，该卷的 JBL，1928 年，在申命记日期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篇文章。你会看到，在 Bewer 身上，你就明白了提前约会的理由；对于达尔来说，当前接受的日期是韦尔豪森日

期 621；然后是巴顿，流放后的情况，将申命记推迟到流放后时期。现在，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您似乎正在争论一个提前日期、621 日期和较晚日期的案例。这有点欺骗性，因为所有这些都接受 Wellhausen 日期 621。因此，当他们谈论早期日期的案例时，他们是在给出案例，然后对其进行批评。或者是延迟日期的情况，他们给出了该情况，然后对其进行批评，然后讨论他们如何接受该日期为韦尔豪森日期。但这些文章很好地总结了大约六十年前发生的争论。争论仍在继续，但您可以回去看看这三篇文章，对其中一些问题有很好的介绍。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其中一篇文章中，Dahl 的文章《当前接受日期的案例》，这实际上是对 Wellhausen 观点的辩护……他在文章的第 360 页上发表了一些评论，并且他就同一个问题这么说。他说：“对于圣经的研究者来说，偶尔重述一下迫在眉睫的批判性信仰的理由是有好处的。”那里有一种释义经文。

“对于《申命记》来说，这一点最为明显。经一致同意，本书在旧约历史、文学和宗教研究中被赋予了中心、关键的地位。希伯来历史进程的伦理重建一直是批判性圣经学术的最高服务和联姻，其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申命记年代的基本正确性。”他说，这个关键结构“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申命记》年代确定的基本正确性。特别是，所谓的摩西第五书与列王记下 22 章中提到的律法书的一致，通常被认为是“旧约研究拱门的基石”。”旧约研究的重点是《申命记》的年代确定。艾斯菲尔德称其为阿基米德点，达尔称其为“旧约研究拱门的基石”。“放弃，甚至严重质疑这一经过几代学者耐心不懈的努力而获得的发现，将涉及对整个批判立场

的重新调整，这无异于革命性的。”这是来自一个捍卫这一观点但承认整个事情取决于申命记日期的人。在该页的脚注中，他引用了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乔治·富特·摩尔（George Foot Moore）在《旧约文学》中说：“申命记是一个固定点，通过参考它，可以确定摩西五经中其他部分的年代，至少可以相对地确定。”然后我们看到格雷厄姆在1927年的《宗教杂志》中指出，“它就成为格林威治的一种子午线，是时间顺序和心理关系中的一个固定点，其他文献可以取代它。”所以你得到了另一个短语。

学生：“达尔引用了这些吗？”

范诺伊：“达尔引用了其他人的话。因此，你就得到了“阿基米德点”、“旧约研究拱门的基石”和“格林威治子午线”，它们指的是申命记功能相对于其余关键结构（JEDP 结构）的日期。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德国人，但他在这里用德语引用了他的话，但如果你翻译一下，就会是，这个德国人说，“申命记的成败决定了整个关键结构，它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精心构建的。” 1900 年代。”

7. 申命记日期的意义。公元前 621 年和其他选项

因此，我花时间详述所有内容的原因是为了让你们牢记申命记日期的重要性和意义。我的意思是，如果将《申命记》定为 621 年是一个错误，那么你就破坏了，你看，这整个复杂的批判理论，而这些人很容易承认这一点。因此，在我看来，申命记的日期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时至今日，

甚至在批评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正如我向您指出的这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一些批评学者说它应该提前移动，有些人说它应该稍后移动。因此，即使在批判性学术界，关于《申命记》应该放在哪里也一直存在争论。就福音派而言，它应该回到它所代表的地方：马赛克时代。所以仍然有很多讨论正在进行。在过去 50 年左右的时间里，韦尔豪森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文章就是对此的反映。正如达尔在同一篇文章的第二页中所说的那样，“批判学者们被机智地描述为一群食人者，他们通过吞噬彼此来恢复活力。”在处理此类问题的流行处理中，您通常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 621 似乎是既定事实；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你看看看期刊和技术文章，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反复进行，甚至在批评学者中也是如此。因此，有人提倡流亡后约会（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有人主张其日期早于 621 年，但晚于摩西；换句话说，将其推回得更早一些，但并没有一直推回到摩西那里。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当然，与此同时，也一直有人为马赛克日期辩护。我的意思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主张马赛克日期的人们都有很好的代表。最后，对于正在进行的所有争论，达尔说：“那么，这里有两个明确的问题仍然等待解决。它们是对旧约批评的挑战。如果以过去的经验为标准的话，这些问题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找到解决办法。”以赛亚书 48 章 22 节（非常随意地翻译）中的话：“耶和华说，‘恶人不得平安’，”这就是以赛亚书 48 章中的内容，但争论仍在继续。

二. 申命记的作者和日期 A. 批判方法综述

好吧，这是罗马 I 下的 C，“申命记日期对 JEDP 理论的重要性”。我认为我无法过多强调其重要性。罗马二世是“申命记的作者和日期：批判方法的调查”。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首先采用我已经提到过的韦尔豪森学派的理论，然后B是“从各个方向对经典韦尔豪森立场的挑战”。1. 被放逐后；2. 日期早于621年，但处于君主制时期；3. 前君主约会但非马赛克，只是比J早一点；4. 马赛克日期的倡导者。所以我们只是对申命记日期的各种不同方法进行了调查。

A. 韦尔豪森学派的理论

So A，“韦尔豪森学派的理论：我已经总结了它的基本特征以及 621 年《申命记》对于一般 JEDP 理论的重要性。但也许让我补充一些细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威尔豪森认为《申命记》是《列王记下》第 22 章及后续章节中提到的法律书，这就是约西亚王时代的故事。这就是列王纪下 22 章中的法律书；此外，他还说这本书是在约西亚时代写的。

在韦尔豪森提出他的理论时，通常的观点是在圣殿中发现的法律书是整个摩西五经，而不仅仅是申命记。因此，在韦尔豪森提出他的观点时，总体的想法是，整部摩西五经是在约西亚时代发现的。但我认为说这只是申命记并不一定是需要争论的事情。可能是这样。很难说它是整个摩西五经还是申命记。认为这只是《申命记》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一些教父认为律法书是《申命记》，其中包括亚他

那修、杰罗姆和金口。他们认为这是申命记，但他们并不否认马赛克的作者。这就是不同点。

1. 德维特贡献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韦尔豪森的观点是，它是《申命记》，但它也是写于约西亚时代的。他从 Wilhelm HM de Wette 那里得到了这一点。德维特提出了申命记大约是在约西亚时代写成的观点，他对此的基本论据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史书中说的，除了明显是后来的文本外，史书中没有约西亚时代之前申命记的踪迹。换句话说，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直到约西亚时代，他说在约西亚时代之前，没有任何申命记影响的痕迹。但是，你看，他通过说“除了明显来自较晚日期的文本”来限定这一点。换句话说，你看他所说的是，你在约西亚时代之前的历史书中找不到申命记的影响。如果您发现某些内容看起来像是受《申命记》影响，那么您就知道这是后来插入的内容，在《申命记》撰写之后又被插回到该文本中。他说：“历史书籍中，除了明显是后来的文本之外。”为什么？为什么它们明显来自另一个日期？因为它们反映了申命记。因此，他断言，“在约西亚时代之前，没有申命记的踪迹。”这是他的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他说，“列王纪下 22 章的内容证实了申命记的内容。”他的意思是约西亚改革的本质反映了申命记中的重点。所以他说列王纪下 22 章的内容证实了申命记的内容。现在，这是两个主要论点。德韦特推测，也许希基家、户勒达或沙番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希基家、户勒大和沙番是谁？

学生：先知。

范诺伊：希勒家是一名牧师。胡尔达是谁？

学生：可能是一位先知。

Vannoy：她是一位女先知，这本书被发现后就被送给了她。沙番向约西亚王宣读了这封信。他是约西亚手下的文士。你看，有三个人的名字与约西亚时代律法书的“发现”有关。因此他推测祭司希勒家、女先知户勒大和文士沙番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所以，你不能确定这一点，但这就是建议，因此，与 621 年法律书的发现密不可分的是，它是在发现的那个时间写成的。因此，这是一次故意的欺骗，或者说是“虔诚的欺诈”。你知道，它并没有真正被发现，它只是被表现为被发现，表现为马赛克，以赋予它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得到了这个虔诚的欺诈想法，人们被欺骗，认为：“这是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

现在，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观点，认为一本具有《申命记》这样内容的书可能是由那些具有足够欺骗性的人所写的，他们以欺诈手段将类似的东西呈现为真实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但有些人认为这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你可能会说，有一种更温和的观点，是由一些同意韦尔豪森/德韦特立场的人提出的。他们说申命记可能是早于约西亚的时代写成的，然后将其移回希西家或玛拿西的时代，这不会将其移回很长时间，但是，他们会说，这是可能是在希西家或玛拿西时代写成的，然后在玛拿西时代可怕的背道时期真正消失了。那么它真的可能在约西亚时代就被发现了。但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都假设《申命记》是在约西亚时期首次公开宣布为法律的。

现在，关于这一观点的另一条评论，我认为很有趣。在这一共识的背后，有一个前提：《列王二书》第 22 章和第 23 章的叙述在历史上是可靠的。因为，你看，这个论点是列王纪下第 22 章和第 23 章的记载，其中对约西亚改革的描述具有这样的性质，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申命记一定是改革的推动力。好吧，那就假设这个账户是可靠的。如果您质疑《列王纪下》第 22 章和第 23 章的历史可靠性，那么您就失去了《申命记》明确历史日期的联系。现在有趣的讽刺是：《申命记》是一个虔诚的骗局，但《列王记》必须在历史上可靠。

学生：“说到可信度，如果这是故意欺骗的话，那怎么可信呢？我不确定你所说的可靠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这是一次故意的欺骗’，那就不太可靠了。”

范诺伊：嗯，我的意思是，我实际上是从这场辩论中得出的，是对约西亚领导下的宗教改革的特征的描述，以及它真正发生的方式。如果你不认为描述是可靠的，那么你就没有基础说申命记是被发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达尔说，在第 376 页，在我之前读过的同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这些章节的历史性受到许多学者的严重挑战”，即列王纪下 22 和 23；“许多学者对历史真实性提出了严重质疑。它们的历史价值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但不是全部。无论对这个主题有什么疑问，将《列王纪下》第 22 章及之后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孤立起来是行不通的，就好像他们的证词是单独的、没有根据的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独立的证据表明，申命记属于文学和宗教发展的特殊领域。”后

来他说道：“但是，事实上，文学批评充分证明了我们记录本质上可信的信念。

《国王》的编辑在这里似乎使用了更古老的书面资料，在风格和思想上与他自己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可能包含在流放前的列王历史中，并且很可能是由约西亚的同时代人写的，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是在 586 年灾难之前写的。，是后来的并不一定将这些章节中的叙述标记为发明，对胡尔达材料的明显修改也没有掩盖主要故事的明显清醒。存在一种过度精致的怀疑主义。”

现在有趣的是，这位批判学者试图为《王二》第 22 和 23 章的历史性辩护，反对那些质疑《王二》第 22 和 23 章历史性的同一类人，并说存在这样的事情：-精致的怀疑主义。他接着用几页纸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说：“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然必须为某些传统预设一个历史基础。当然，它们并不都是用整块布制成的。约西亚国王的改革似乎比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更好的证明。概率的平衡似乎绝对有利于 2 Kings 22 的普遍历史性。”发现一个像这样的人试图在《列王纪下》第 22 章和第 23 章中论证历史性以支持这一理论，这真的很有趣，而通常的方法却恰恰相反。但你明白为什么这与此案有关。一些想要将《申命记》推迟到更晚日期的人对《列王纪下》第 22 章和第 23 章的历史性提出了质疑。

这就是韦尔豪森的基本立场；我想关于一般理论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达尔认为，存在大量的独立证据可以将申命记置于以色列文学/宗教发展的背景下。他试图让我们相信他的结论是基于历史证据的。

2. 宗教历史贡献

但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现在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以色列的宗教以进化模式发展，就像其他地方的宗教被认为已经发展一样，当你看摩西五经时，你会发现这些宏伟、复杂的上帝概念，即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在以色列早期不可能存在。你发现如此崇高的上帝概念一定是迟到了。所以创世记第一章是P；这是写在《流放》里的。我认为，事物的进化方案才是其核心。他们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待，试图用历史批判的方法重建一部以色列宗教发展的历史。

3. 反奇迹偏见

他们所致力于的历史批判方法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排除神圣干预和此类奇迹的方法。换句话说，历史批判方法必须通过自然因果关系观察并能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你必须用历史来类比。这意味着当我们读到不属于我们自己经历的事件时，那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的类比是一种对你是否可以接受神的干预和奇迹的控制。方法论的建立方式是这样的：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神圣的干预或奇迹，假设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所以如果你在文本中找到它们，我们就知道那不是真的，而且很可能是神话。所以你看，它是基于那种自然主义方法论，并将其强加于本质上与这种方法论陌生的材料上。但这应该是科学的。

我想我们最好休息 10 分钟。然后我们将继续“来自各个方向对韦尔豪森立场的挑战”。我们将在第二个小时内讨论这个问题。

转录：艾米丽·登布莱克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